

赵 林 李  
殿 绍  
增 向 明

主  
编



三星堆  
与巴蜀文化

SANXINGDUI SITE AND  
BA — SHU CULTURE

巴蜀书社





K 203  
L 254

#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SANXINGDUI SITE AND  
BA — SHU CULTURE

主 编

李绍明 林 向 赵殿增

巴 蜀 书 社

02127

(川)新登字 008 号

责任编辑:范 勇

封面设计:李永宪

---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李绍明 林 向 赵殿增 主编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东方福利彩印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75 插页 字数 300 千

1993 年 11 月第一版 199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190 册

---

ISBN7—80523—526—0/K·110

定价:15.65 元

# 目 录

论古蜀文化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 .....	林 向 1
古蜀人的来源与族属问题 .....	李绍明 11
试论早蜀文化的渊源及族属 .....	范 勇 17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两个问题 .....	王家佑 李复华 27
从夏商时期鄂西文化遗存看早期巴族——兼谈“巴”“蜀”非相同族属 .....	张 雄 33
鱼凫族探源与三星堆断想 .....	管维良 41
试论氏与蜀的关系 .....	杨 铭 49
巴文化原生形态初探 .....	黄晓东 曾凡模 54
巴蜀早期城市的起源 .....	段 渝 61
四川商城 .....	〔美〕罗伯特·W·贝格勒 雷 雨、罗亚平译 69
三星堆饕餮纹的分析 .....	李学勤 76
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 .....	赵殿增 81
广汉三星堆出土铜像考释 .....	龙 晦 93
广汉青铜人物群雕的美术史价值 .....	李 松 101
三星堆青铜人像群的社会内容和艺术形式初探 ——兼与中东地区上古雕塑艺术之比较 .....	范小平 107
中国古代的日晕与神话图像 .....	〔日〕林巳奈夫 杨 凌译 116
广汉、安阳祭祀坑比较研究 .....	徐自强 136
论三星堆遗址及相关问题 .....	宋治民 145
论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非同一民族所为及相关问题 .....	李安民 152
早期蜀国玉雕初探——商代方国玉器研究之一 .....	〔香港〕杨建芳 160
试论广汉三星堆发现的玉瑞 .....	王永波 170

略论巴蜀货币 .....	陈丽琼	183
广汉三星堆出土金器管窥 .....	邱登成	192
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 .....	江玉祥	198
巴族与蜀族文字考辨 .....	钱玉趾	205
论陕南城、洋地区青铜器及其与早期蜀文化的关系 .....	刘士莪、赵丛苍	210
陕南巴蜀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兼论蜀与商周的关系 .....	魏京武	218
鄂西峡江沿岸夏商时期文化与巴蜀文化关系 .....	王 劲	227
荆楚地区巴蜀文化因素的初步分析 .....	杨权喜	233
蜀楚文化发展阶段试探 .....	郭德维	243
蜀文化中的楚文化因素 .....	施劲松	250
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 .....	王仁湘、叶茂林	257
西藏考古新收获与远古川藏间的文化联系 .....	霍 巍	266
“瞿上”再考——三星堆为鱼凫旧都“瞿上”说 .....	〔日〕徐朝龙	275
楚道考——兼述“古楚国” .....	李伯章	285
三星堆的发现发掘与遗址的保护利用 .....	肖先进	291
编后记 .....	李绍明、林 向、赵殿增	296

# 论古蜀文化区

## ——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

林 向

(四川大学历史系)

过去，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只讲黄河流域由龙山时代到夏商。七十年代扩展到辽河流域由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长江中下游由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到吴越、荆楚<sup>①</sup>。八十年代成都平原三星堆——十二桥遗址的发掘；川西广元、绵阳、汉源等地的考古发现<sup>②</sup>，使人们的眼界大开。原来，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在四千多年以前也已经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渡。当然，发展不可能是均衡的，但文明的光芒已经从成都平原放射出来，无可置疑。巴蜀地区的古代文明有共性也有个性，其具代表性的文化特征，形成了一个客观存在的、有明显地理范围的文化地域——古蜀文化区。

这个突破是从广汉三星堆开始的。追溯从1929年广汉真武宫发现玉石器，1933年正式发掘，到1986年三星堆的发掘以及近年来的工作，六十多年来，三星堆遗址群已为我们显示了古蜀文化区的核心内容<sup>③</sup>，鉴于先秦文献对巴蜀史迹记载的残缺，秦汉以来追记的文献如《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等，其可靠程度有待论证。那么，现在有了三星堆考古这把标尺，我们可以探索隐藏在历史迷雾中数千载，罕为人知的东亚腹地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的真面目。当然，真理的认识过程是条长河，永无休止，这里只是提出一个限于目前水平的概略看法。

### 一、古蜀文化区的地域与年代

巴蜀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是战国秦汉时才形成的。《史记·苏秦传》说秦“西有汉中，南有巴蜀。”《李斯传》载谏逐客书曰：“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在殷周之际，则只称蜀。《后汉书·光武帝纪》注：“蜀有巴郡，故总言之（巴蜀）”，就保留了古老的地域概念。殷墟卜辞与周原卜辞均有蜀无巴，故可遥称为古蜀文明。其地域范

围我们曾加论证：“殷墟卜辞中的蜀的中心地区在成都平原，蜀文化圈的范围大体上和后来《汉书·地理志》所载与巴蜀同俗的地域相当。它在江汉地区与南传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关于殷墟卜辞中蜀的地理位置，目前还有不同意见，但多数学者仍主张在“陕南或四川境内”笔者亦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变。古蜀文化圈的内涵是所谓的“早期蜀文化”，以资与东周的“巴蜀文化”相衔接和区别。

这个文化圈的范围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具有三星堆——十二桥蜀文化性质的遗存在成都平原原有密集的分布；含有蜀文化因素的遗址在雅安沙溪、汉源麻家山、阆中坪上，忠县中坝以及江汉平原西部均有发现<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含有蜀文化因素的多寡，和该遗存与成都平原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呈现出蜀文化向外传播的波圈现象。可见，三星堆、十二桥确是古蜀文化区的中心遗址。

关于古蜀文明的年代，我们曾就中心遗址的出土物结合地层叠压关系，分期如下<sup>②</sup>：

遗址名称	新石器晚期文化	古蜀文明					著 录
		夏商间	殷商	商末周初	西周	春秋	
广汉三星堆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	✓	《考古学报》1987.2.
三星堆祭祀坑 (一、二号)			✓				《文物》1987.10; 1989.5.
成都十二桥		早期	中期	晚期	✓	✓	《文物》1987.12.
新都水观音			早期墓	遗址	晚期墓		《考古》1959.8.
成都羊子山土台				✓			《考古学报》1957.4.
成都指挥街					早期	晚期	《南方民族考古》 第一辑 1987年

此表下接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此处从略。其年代推断为近年来碳十四测定所证实。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的年代在距今 4740±115 到 4075±100 年之间；第二、三期的年代距今约 3935±240 到 3165±285 年之间；第四期的年代距今 2875±70 年。十二桥遗址早期年代距今约 3680±80 年<sup>③</sup>。总之，相当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时期。

过去，学者们囿于识见往往不相信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颡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姪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现在有了地下证据，以“两重证据法”可证常璩并非凿空之说，是实在的历史投影。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在东亚“两河流域”——长江黄河之间的沃野上，长江上游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华阳之地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孕育出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中心，那就是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类型）或称为夏商周

时代古蜀文明。称它为文明中心，因为它是这一大片广袤的西南土地上，众多具备建立国家条件的青铜文化（包括巴文化）中的佼佼者，影响着附近许多发展水平不齐的文化综合体，以古蜀文明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化区。我们借用司马迁叙述西南夷的体例，称为：“华阳之地君长以百数，蜀最大，此处有城邑、青铜业、礼仪中心、艺术和文字符号”。

## 二、古蜀文化区的生态环境与聚落形态

巴蜀在秦汉时候以资源富庶闻名天下。司马迁到过巴蜀，《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楚，僮童，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棧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馆穀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汉书·地理志》：“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僮童，西近邛笮马牦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柔弱偏陋。”“蜀”成为汉代富裕地区的同义词，班固《西都赋》称汉长安附近是“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木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李善注曰：“言秦境富饶，与蜀相类，故号近蜀焉”。

蜀地——成都平原的富饶美丽是古来如此，《山海经》曾记录了这方乐土的动人神话，《海内经》：“西南黑水、青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居，此草也，冬夏不死”。这是对成都平原的写照。汉晋人看到的本是“广都之野”，如《史记集解》所引，郭璞注《海内西经》、张衡《思玄赋》、及李善注引《淮南子》都作“广都之野”。而今本《山海经》、《淮南子》误作“都广之野”。《蜀王本纪》：“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汉武帝在此因古地名设广都县，大概在成都市南双流地界，所以，杨升庵《山海经补注》：“黑水广都，今之成都。”有学者以为黑水广都是古齐鲁之地<sup>①</sup>，那是不对的。

我们认为《山海经》汇集了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四方各族的传说与见闻，经文士们不断加工发展而成，其中有齐鲁稷下学者们的手笔，他们囿于识见，张冠李戴；鲁鱼亥豕，把事实化为神话之类均有之，但“广都之野”决不可能定在华北地区的。文中记载此地南稻北粟均有，冬夏播种，冬草不死，这在华北地区是不可能的。我们试“以今律古”作个比较：（1）年平均气温：华北地区 8℃—14℃/四川盆地 16℃—18℃；（2）大于 10℃的积温：3500℃—4500℃/5000℃—6000℃；（3）0℃以下日数：90—100 天/5 天以下；（4）正常年降水量：400—800 毫米/1000—1600 毫米；（5）华北地区冬季气温太低，植被以夏绿落叶阔叶林为主，冬天不见绿草，露天不能种植，在能种冬小麦的地方，地上麦苗也得冻枯，来春返青。而四川盆地日平均气温保持在 0℃以上的农耕期全年在 360 天以上，即全年都是农耕期；（6）日均温持续在大于 10℃为植物活跃生长期，华北地区



只 200—220 天。四川盆地为 250—280 天<sup>⑧</sup>。当然，据竺可桢等专家研究：华北地区在夏商时期平均气温比现在约高 2℃，据此推算一月份日均温还是在 0℃ 以下；到西周时气候变得寒冷干燥，汉水两次结冰，接着大旱<sup>⑨</sup>。可见，先秦时期要做到冬夏播种，冬草不死，只有四川盆地才可能，广都之野只能在蜀地——成都平原。

近年来考古标本的测定也证明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环境条件是十分宜人的。1986 年在成都指挥街遗址发掘采集的孢子花粉分析表明：在距今约 3000 年前（殷周际），该地有密茂的阔叶林，林中有丰富的蕨类植物，附近有湖沼水面，藻类植物较多，气候温暖湿润。距今 2500—2800 年前（东周间），针叶树增加，形成以针叶树为主的针阔混交林，蕨类增加，出现禾本科花粉，气候依然潮湿温暖，宜于种植业发展<sup>⑩</sup>。我们曾论证殷商时期三星堆遗址蜀文化中出土大量的铜、陶酒器，证明蜀地“必有发达的酿酒业，就必有发达的农业生产为基础”<sup>⑪</sup>。而且，这种良好的生态环境变化幅度不大（与华北地区相比）。根据什邡上新统湖相层的孢粉分析，代表一个温暖潮湿的古气候环境，其植物种属与指挥街商周时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而且有禾本科花粉的存在<sup>⑫</sup>。成都方池街第五层（春秋战国间）出土的兽骨鉴定基本上属于平原湖泊及浅丘地带的种类，其中鹿科占 60% 以上，是主要的狩猎对象，猕猴与犀牛的存在表明相当湿润温热，猪、马、羊属于饲养的畜类。孢粉有水龙骨科，蕨属、榛属和禾本科植物<sup>⑬</sup>。反映当时蜀地的种植业、饲养业和渔猎业是人们的主要经济生活，这与《山海经》所记广都之野的百谷自生、鸾凤歌舞，百兽群居的富饶环境是一致的。

在这样优良的环境下，食品丰富使人口增长和集中，形成聚落，并向城市演化。城市化是文明进程的主要内容，城市成一个经济文化区域的核心，并与邻近的一系列大小聚落形成网络。成都平原上古蜀文明的遗存星罗棋布，而在广汉与成都两地形成两个巨大的商代城邑（后者可能略晚），形成双子星座式的城市布局。据调查三星堆遗址群在方圆 12 平方公里范围内，有遗存 60 余处，可分为六个区。成都市区的遗址也十分密集，较早的（商代）在西边如十二桥、方池街、抚琴小区等，稍晚的（周代）在君平街、指挥街、岷山饭店及东郊等地均有发现，因市中心不易探查，成都市商周遗存面积也不会低于三星堆的。据英国柴尔德的估计新石器时代村落平均有 200 至 400 人。苏美尔古代城市人口在 7000 至 20000 人；印度河谷的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的城市人口接近 20000 人<sup>⑭</sup>。若依此推算，以广汉三星堆与成都十二桥为代表的商、周城市人口至少各在 24000 人以上，应当是古蜀文化区内的中心城市。

### 三、古蜀文化区的地理条件

综观西亚肥沃新月地带美索不达米亚、北非尼罗河谷、南亚印度河谷的古代文明城

市兴起的地理条件可归纳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既要充足，还要多样）、有利于抵抗风险（包括天灾人祸）、交通便利（交通线上要广有市镇村落）<sup>⑧</sup>。古蜀文化区所在的主要地域四川盆地的地理条件也十分相似，而有特色。

我们来看四川盆地的环境条件：四周为中山和高山环绕（海拔1000—5000米），西为青藏高原，南为云贵高原、北为秦岭与大巴山、东面为巫山山脉，地势由四周向盆心倾斜（海拔300—600米），主要由侏罗纪和白垩纪紫红色砂页岩组成的水平岩层，在河流地割下形成台状丘陵性的红色盆地，盆内多方山地貌。长江横贯盆地南部，盆地内河流均汇入长江，形成不对称向心状水系，主要支流在北岸，有岷江、沱江、嘉陵江等。在长江及其支流两岸分布着无数由一、二级阶地组成的冲积平原——平坝，这些平坝面积大小不等，地面平整，土壤肥沃，便于灌溉，连同附近的方山丘陵，形成一连串绵延不断，而又互相隔离的农业小区。如嘉陵江上阆中七里坝、彭城坝，高出水面8—10米，长2—3公里，宽200—400米以上。涪江在江油至绵阳70公里长的两岸有高出水面3—5米或8—10米，宽1—3公里或7—9公里不等的连续坝子。长江上游的平坝较大，如江安平原长10—12公里，宽2—3公里，最大的冲洪积平原在盆地西缘的岷江中游，在九顶山邛崃山与龙泉山之间，形成一块面积约7337多公里的成都平原（实际是大盆地中的小盆地），它是以岷江沱江冲积扇为主体的山前倾斜扇形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坡度约千分之四，平原上河网交错，沟渠密布，水源充足，自流灌溉，土壤属肥力较高的灰色潮土型水稻土。从全球气候来看此地正处于北纬30°线上，应属于副热带回归高压带，干热少雨，属于荒漠或半荒漠景观，可是四川盆地因处在青藏高原东侧，改变了行星风系，距海洋（太平洋、印度洋）不远，使之具有明显的季风气候、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景观。又因地形复杂，气候也复杂，从热量带有亚热带、温带和亚寒带；从水分条件看，以湿润地区为主，也有少许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尤其因高程差异，在垂直方向上变化急骤复杂，气候垂直带谱结构的多样性是十分罕见的<sup>⑨</sup>。

综上所述，这样的地理条件对古代文明的发生发展是有利的。（1）本区的资源丰富，食品有余，水源充足，特产更多，其矿产资源因地质构造具有的多期性和复杂性，成矿物质类型多样，基础丰厚，如铜、铁、金、银、铅、锡、汞、盐、碧玉、天然气等都适合古代开发。从动物地理观察，动物化石兼跨大熊猫——剑齿象动物区和北方区两大区。现生种与之衔接，分东洋界与古北界两大区系<sup>⑩</sup>。《禹贡》、《华阳国志》所载犀、象、熊、狐、狸、猿、猴、鹿、牦牛以及各种毛皮都很早被开发利用的。加以北粟南稻、旱菽水芋、瓜果蔬菜，山林竹木，蚕桑漆蜡，麻纴毛织更是应有尽有。难怪本世纪初俄国瓦维洛夫就把古蜀地区——从鄂西到川西山区及其附近低地作为全世界作物栽培八大中心之首，列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早的农业中心<sup>⑪</sup>。这样的资源条件，对古蜀文明城邦社会的需求是足够的了。

（2）本区地势有利于社会安定。本区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四周高山屏障、内部是河

流丘陵交错，限制了北方车、骑武装的入侵。秦岭北列，隔断了北方寒流的侵袭；东南两面山原相对不高，而西有世界屋脊——帕米尔山耸峙，从太平洋、印度洋来的暖湿气流进入盆地后，受阻于西、北山原能长期滞留，大大改善区内水热条件。加上地形与气候多样化，不可能有大面积的水、旱灾害，山上旱山下补，山下涝山上补，能做到丰歉互补。环境的复杂多变更促进人们造成巧思勤作，幽默善解，不畏艰险，善于逆境中求发展的精神风貌。十分有利于初期文明社会的安定与发展。

(3) 本区位置便于交通。地处东亚腹地，两河之间，东出三峡即是云梦大泽，俯临长江中、下游；北面有斜贯西北与东南地区的汉水通道；西面紧挨横断山民族南北迁徙的“藏彝走廊”；向南可直接南中，与东南亚、南亚以致西亚交往。司马迁说：虽“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当是亲见的实情。古代的民族迁徙，商旅往来是不会有大的困难。山区的山麓地带，丘陵的河谷地带都有接连不断的人烟村落可供往来行歇。当然前提必须要政通人和，民族和睦，再不然中央必须在当时当地具备人力物力上的压倒优势，否则村寨小国就会作梗，把通途变成堵塞的瓶颈。汉代通身毒道受阻并非蜀道天险之祸，而是小国割据之故。

#### 四、古蜀文化区的文化特征与源流

古蜀文化区因正处在东方沿海及东南半壁以稻作农业为主的东南文化板块(区)，与西北黄土高原地带以粟作农业为主的西北文化板块(区)之间的交接线上<sup>⑨</sup>，加以区内人文地理环境的多样化，故其文化面貌斑驳不纯。但其文化特征的组合则在东亚大陆独树一帜。现在，我们可对其作一般性的归纳表述。

本区在商周时期社会生产已具备多种经营的“立体农业”的雏型：农作物是稻、麦、黍、稷、豆类、“百谷自生”，园艺发达，有“四季瓜果”；“牲具六畜”，家养鸡、犬、猪，野牧马、牛、羊；发明的梯田(山原田)与堰渠配套，建设大型的水利工程，长于兴利除害，池陂是蓄水与养殖并重。手工业已独立发展，建立起商业交换网络。开矿冶铜采丹砂，开发盐泉火井，青铜铸造业属于“二次发明”的范例，创造的人神、鸟兽、花木铸型独步于世；黄润丝绸，罐式发酵酿清醴，价比黄金；竹木陶胎漆器，源远流长。有舟无车，人负畜驮，索桥凌空，栈道千里，是与“四塞”环境斗争的结晶，四方交往无所不通。

聚落星罗，遍及平坝丘陵；城邑峙立在平原上，其“城墙”兼有堤坊，防御、营建宫室与祭祀神坛等多种功能。地面建房有方形、园形、长条形，即有木骨泥墙的小屋，又有干栏木构，抬梁编墙，还有地梁载柱的宫殿，后者更属举世首见。

信奉以祖灵和神树为中心的“泛萨满教”，盛行巫术，卜甲不钻不凿，有超大型的多

级祭坛，祭器以青铜尊彝和玉石璋璧为主，祭仪有燎、有埋，以人俑牲畜为牺牲，有政教合一的祭司与君长。作战以步卒为伍，有战船，执短戈、长矛、斤钺、掷剑、圆盾。丧葬土埋，有“圜罐葬”、“船棺葬”、“石棺葬”等不同葬俗。

蜀文化典型的陶器群有：小平底罐、高把豆、高领罐、尖底罐、管足盃、鸟头把勺，瓶形杯、尖底盏和三足炊器。其中富有复合文化的特征，如把西北盛行的鬲与东南常见的陶器腰沿做法相结合，制成独有的三足炊器。陶盃的足，既有中原的乳状圆足，也有西北的爪状扁足，还有把三个本地尖底角杯作管状足。

人体装饰更反映文化复合现象。发式有辮、披、断、笄、椎结、戴冠等数种。贯耳文身，当然是东南文化区的特征。衣衽有左有右与对襟并存，有“燕尾袍”，牛鼻裤；赤足系屨，或著靴鞋。身姿以双手捧物两脚分立为恭敬，以危坐为燕居。砍头的人牲则双手反缚，双膝跪地。面部体征：既有长脸高鼻，也有扁脸阔鼻；眼眶有半圆突睛，也有丹凤细眼；方颌大耳，无不阔咀紧闭，没有张口露牙是一大特色；以“纵目”与鼻梁架云者为神。

这些文化特征分析表明：本区的民族系属比较复杂，而本底一部是氏，一部是濮。“荆人王蜀”的传说是历史事实的反映，那就是代表东南文化的濮越，曾在此加入代表西北文化的氏羌，再加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的流入，在本区形成文化综合体的杂交优势。

本区文明的源头是十分悠久的。这里很可能是“人类的摇篮”之一，巫山龙骨坡洞穴曾出土四枚距今约两百万年的古人类牙齿化石，这也许是亚洲发现年代最早的人类祖先<sup>①</sup>。汉源的富林文化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制作场，它属于我国小石器传统<sup>②</sup>，代表着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第一期山林采集狩猎阶段的遗存。广元的中子铺文化则代表着第二期山前农业阶段，那里出土的独具特点的细石器，与粗陶器、磨制石斧、梭形石刀共存，年代当比四川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存为早<sup>③</sup>，这些都是在盆周中山丘陵上进行的生产变革。巫山的大溪文化遗存有发达的原始农业与氏族墓地<sup>④</sup>，三星堆一期文化的陶器则代表更晚一点第三期阶地农业阶段，意味着从山前农业向平坝农业的过渡开始了，氏族社会的鼎盛期。所以，巴蜀文化区的文明有着悠长的源头，经过长期的孕育，而文化综合体的杂交对文明的诞生起到了催产作用。

巴蜀文化区曾有许多独创性的文化发明，例如栈道、索桥、梯田等都是古人与自然环境斗争的文化结晶。这里试以巴蜀地区梯田开发为例说明之。我国农业起源于山地，特别是山前地段（山麓）<sup>⑤</sup>。蜀文化有“鱼鬼田于瀟山”，“杜宇移治郫县，或治罨上”的传说，反映鱼鬼时代还属于山麓农业阶段，而杜宇时代则是“降丘宅土”的阶地平原农业阶段了，三星堆遗址很可能就是杜宇的治地罨上。山前农田坡度太大，水肥容易流失，完全依赖天上降水，是不可能具有较高的农产量的，降至平原农田开发就有很大潜力了。但本区的平坝面积不大，（今四川省内平坝只占总面积的 2.54%），且沿河分散成小坝子，其面积过小，必须与周围的丘陵一起形成农业小区。这就促使人们对丘陵农田的开发——



那就是梯田的发明。梯田之名最早出于宋范成大《骞鸾录》：袁州（江西宜春），“岭阪之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其实巴蜀地区很早就有发达的梯田农业，四川彭水东汉墓出土的陶田模型，丘形狭斜，相接如鱼鳞，略呈阶梯形，就是梯田模型<sup>⑧</sup>。1974年成都东郊东汉墓也出陶梯田模型，成裤叉形。这可与《华阳国志》：涪县有“山原田”（梯田）与“平稻田”（平原田）不同；郫县、广汉、德阳等均有“山原田”种水稻的记载相印证。梯田的开发还可上推，抗战期间吴金鼎等人在洱海发掘的佛顶峰和马龙遗址早期相当于西周时期（约距今3000年）的遗存，即有梯田，在溪流附近的房屋周围，山坡被开成一层层平台，“经发掘后，证明此类平台为古人住处及农田”<sup>⑨</sup>。最近川大考古实习队在汉源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中，同样发现房屋与农田所在的山坡被开辟成层层平台（形成梯田雏形）其年代约距今4000年以上<sup>⑩</sup>。那么可以说，这种梯田的发明权确实属于巴蜀文化区。在本区以方山丘陵为主的地貌的影响下，人们很快利用这种桌状、台状、阶梯状的水平山地进行种植，进而垒石筑坝有意识的改造坡地成梯田，再进而引溪水灌溉，更进而利用河流落差或筑堰提高水位灌溉梯田，就成为蜀中特有的“山原田”了。这种因地制宜，辟成水平梯形，不成方块，冬夏播种，水利灌溉的“山原田”是与华北地区的“井田”、“爰田”不同的耕作田制。梯田是蜀文化的一大贡献，其源远流长，至今四川的梯田建设还是闻名于世的。

## 五、古蜀文明的消融

古蜀文明在夏商周时期曾辉煌上千年，它北与中原进行双向交流，东化荆楚，西涵“藏彝走廊”，南通南中、东南亚并与西亚交往。有学者把蜀地商周时水观音遗址与楚腹心地东周季家湖楚城出土物进行比较，认为早期是蜀文化影响楚文化。相反到了战国时期蜀地新都大墓（可能是开明王陵之一）中却有强烈的楚文化因素<sup>⑪</sup>。这个“由蜀化楚”到“由楚化蜀”的变化，是值得玩味的。古蜀文明到西周后期突然黯淡失色。春秋时的蜀文化面貌不清，文献阙如，考古资料也有断线的情况。战国时期引进了巴文明，形成了巴蜀文化发展的又一个峰点，可以新都蜀王墓、涪陵巴王墓与各地船棺葬等考古发现为代表，但已不能与东周列国的文化发达情况相提并论了。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从此巴蜀文化体系逐渐被西北来的秦文化与东南来的楚文化所涵化，消融在中华大文化区之内。秦汉以后的巴蜀文化只是一种广义的地方性文化，它有继承巴蜀传统，保持固有文化面貌的一面，但它与其它地方性文化之间，已由“大异小同”演化为“大同小异”，失去了特质。

巴蜀文化在短促的强光闪烁之后很快消融的原因何在呢？！试举四点。

(1) 秦灭巴蜀，接着兼并六国统一中华，从政治上打破了承袭氏族部落社会以来文

明初期地域文化隔阂的畛畦，造成文化大一统的趋势。而且巴蜀文化与中原及秦、楚等文化，本来就是亲缘文化，在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包括文明发生发展的各阶段，他们之间都存在着双向或连锁式的交流与联系。所以巴蜀文化体系很快被涵化而融失，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它是顺理成章逻辑发展的结果。

(2) 本区地理环境复杂，地形四塞，不如华北、华中那样有广阔的原野可供驰骋，进取心不强，难以问鼎中原，始终是个“西僻之国”而且区内平坝呈列，互相隔离，氏族部落众多，据考证巴界境内的“诸侯”多达百数十个<sup>①</sup>，文化综合体的发展又不平衡，有的已建国，阶级对立，有的还在原始社会，各自为政，易受四邻影响，区内的文化向心力受损，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文化实体。

(3) 本区的核心蜀文明的发祥地成都平原规模不大(200×40—70公里)，虽然物产丰富，若供一族一国进入文明社会当然足足有余，而要兼并全区形成大国则底气不足，所以蜀文明相对柔弱，文化辐射力不强。若与秦据关中八百里秦川，楚处江汉四达之国相较，确有劣势，特别是缺乏经济文化的后续实力。故由“蜀强楚弱”转化为“楚强蜀弱”；七国称雄，巴蜀已无力问津盟会就不足怪了，再加上此地正当帕米尔山结青藏高原的东缘，西山坡面迎风，夏雨集中，形成“西蜀天漏”，江沱泄水不及，便常常酿成水灾，沿河平坝就会一度变成泽国，曾多次造成社会动荡。我们曾指出，三星堆遗址第七层是20—50厘米厚的富水淤泥层，它就是洪水滞留，造成国破城迁的证据。这个事件就是《蜀王本纪》所载：杜宇时国力鼎盛而突遭“若尧之洪水”，因此被荆人鳖令取代政权，建立开明王朝的历史<sup>②</sup>。三星堆遗址的“城墙”埂子也没有护住杜宇疆国的社稷长存。

(4) 本区内部氏族部落林立，社会发展水平又参差不齐，没有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军事力量又较差，只有步卒、短兵，没有战车、长兵，天险虽然可凭而与发展交通相矛盾，金牛道之开通，就知道巴蜀之难保了。加上巴受楚挤，西进与蜀为仇，纷争不休，又都缺乏有魅力的首领人物为核心，一旦被强秦利用，各个击破，只落得国破民散，文化也被涵化了。当然巴蜀文化的余响甚为久远，则这是后话了。

## 注 释

①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三章。

②三星堆考古报告见《考古学报》1987年2期；《文物》1987年10期、《文物》1989年5期；十二桥简报见《文物》1987年12期；广元中子铺简报见《考古》1991年4期；广元张家坡简报见《考古》1991年9期；绵阳边堆山简报见《考古》1990年4期；汉源大树简报见《考古》1991年5期等等。

③林向：《近五十年来巴蜀文化与历史的发现与研究》，《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

④雅安沙溪简报见《南方民族考古》第三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0年；其它地点可参见本书所收。

⑤林向：《成都平原早期蜀文化遗存初析》，《成都文物》1988年3期，此有增删。

⑥参见《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 ⑦何幼琦：《海经新探》，《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第73页起。
- ⑧上海师大等：《中国自然地理》，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二章。
- 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
- ⑩罗二虎等：《成都指挥街遗址孢粉分析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84年。
- ⑪⑫林向：《蜀酒探源》，《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 ⑬刘兴诗：《四川盆地的第四系》，四川科技出版社1983年，第119—123页。
- ⑭转引自王毅：《成都市巴蜀文化遗址的新发现》，《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第307页。
- ⑮戈登·柴尔德《城市革命》（1950年），《当代国外考古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
- ⑯H·J·德伯里：《人文地理：文化、社会和空间》，北师大出版社1988年，第十五章。
- ⑰西南师大地理系：《四川地理》，第二、三章。
- ⑱何信禄：《四川脊椎动物化石》，四川科技出版社1984年第八章。
- ⑲N. I. Vavilov 《The Origin, Variation, Immunity and Breeding of Cultivated Plants》，《Chronica Botanica》XII，1949年。
- ⑳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州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 ㉑黄方波等：《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
- ㉒张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5卷1期1977年。
- ㉓《四川广元市中子铺细石器遗存》，《考古》1991年4期。
- ㉔林向：《大溪文化与巫山大溪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 ㉕李根蟠等：《中国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考》，《农业考古》1981年1期。
- ㉖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22页图13。
- ㉗吴金鼎等：《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甲编，李庄，1942年。
- ㉘承川大考古实习队马继贤同志见告。
- ㉙郭德维：《蜀楚关系新探》——从考古发现看楚文化与巴蜀文化，《考古与文物》1991年1期。
- ㉚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6—184页。

# 古蜀人的来源与族属问题

李绍明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关于先秦蜀人的来源与族属，历来说法不一，迄今尚无定见。究其原因，一来文献资料缺乏，二来出土文物不多，从而使得这项研究难以深入。近来，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古蜀文化遗物，给予进一步探讨此类问题带来希望。今略述管见，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 一、蜀国的疆域与民族

先秦时期，蜀既是一族称，也是一方国。据甲骨文记载，至少在殷商后期，蜀已成为一方国，并与殷王朝发生过密切关系<sup>①</sup>。《尚书·牧誓》谓：武王伐纣，至于牧野，“逖矣西土之人，庸、蜀、羌、鬲、微、卢、彭、濮人”相从。此《牧誓》所列八国中，蜀的疆域应与殷的领土相邻。

时扬

先秦史籍未记载蜀国疆域，汉时杨雄、谯周辑录《蜀王本纪》亦未明言蜀的四至。迄至晋代，常璩作《华阳国志》，始追述及蜀国的范围。《华阳国志·蜀志》云：“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王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常氏所言，当有所本。至于以七国称王时杜宇乃称帝，其说不确，前人已指出其谬误，杜宇应为时更早<sup>②</sup>。常氏言蜀国疆域，大体可从。蜀的北方，拥有褒斜，此乃汉中盆地通向关中秦川的要道，历来如此。《史记·秦本纪》谓，秦惠公十三年（前387年），“伐蜀，取南郑。”亦可知汉中一带在蜀国境内。在西北方，蜀拥有的汶山，相当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带，其北边数县乃草地，至今仍为畜牧业的区域。蜀的西方，拥有熊耳和灵关。熊耳山在今青神县，灵关在今芦山县，两处皆在川西盆地的边缘。在南方，蜀的领域达到南中，



即今云南、贵州西北部一带。蜀的东境，未曾明言，盖由于巴与蜀犬牙交错可分而又实不易分的原因。不过，蜀国中心或主要部份在今川西一带是明确的。常氏所言的玉垒、峨眉二山，以及江（岷江）、潜（嘉陵江）、绵（绵远河）、洛（雒水）四江，主要在四川西部就是最好的说明。

蜀国疆域，如此广阔，故境内民族甚多，除居于统治地位的蜀族外，尚有其他一些被统治的民族是显而易见的。关于蜀族本身问题，下文将要述及，在此先讨论蜀境内的其他民族。关于蜀境其他民族《华阳国志·蜀志》言，其属有“滇、僚、賚、僰僮仆，六百之富。”邓少琴先生释为六个民族，以仆为濮人，而以僮为邛字误写<sup>⑧</sup>。鄙意以为，此处仍释为滇、僚、賚、僰四族的僮仆为当。兹略述诸族如下：

滇，为一族名，亦为一国名。其中心当在今云南滇池周围。《史记·西南夷列传》谓，楚庄王苗裔庄跻，于战国之际入滇为王，滇始与中原发生了联系。自近来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大量滇国遗物来看，滇文化的面貌已日益清晰。在此基础上，前人已对滇文化的族属作了有益探讨<sup>⑨</sup>。笔者以为，滇国的王室与主体民族应为濮人，亦即史籍中所称“滇濮”。濮与越为一大族系，二者同源而异派。濮越系民族为今日壮傣语族的先民。笔者早著文论及，现不赘述<sup>⑩</sup>。

僚，为古代南方一大民族，见于汉代史籍。南中一带，僚常与濮混称，而在岭南，僚又与俚混称并用。东晋时，僚人从今广西、贵州一带北上，“自汉中达于邛笮”。迄至宋代，广西部份僚人已改称壮，僚人的一部份后裔为今日的仡佬族，可见僚人亦属濮越系的民族。

賚，见于汉时典籍，原为古代巴人对赋税的称谓，《华阳国志·巴志》谓，汉高祖灭秦时募发其人，相约不供租赋，遂有此名。賚，实为《后汉书》所称的板楯蛮，大量分布于今川东的巴地，而蜀境内亦有其民。关于賚人的族属，笔者以为濮越系较妥。魏晋以降大部份賚人与汉族融合，少数后进的停留于山区，或即唐时的南平僚。

僰，为一族称，《说文》谓：“僰，犍为蜀夷也。”秦汉时，主要居于今川南宜宾一带，即《汉书·地理志》所谓“僰道”，应劭曰：“故僰侯国也。”今云南白族的先民为僰人。僰人在汉晋史籍中往往与羌并称，可知僰属氐羌系民族。氐羌系民族为今日藏缅语族的先民。

蜀境民族实不止此。如《华阳国志·蜀志》又言：（保子）“帝攻青衣，雄张僚、僰”。按青衣为一支羌人的名称，分布在今雅安地区青衣江的上游，故至今这条江又称羌江。直至秦汉，在青衣羌地设置郡县，这支羌人遂逐渐与汉族相融合。根据秦汉时川西民族分布的情况上溯，先秦蜀国境内还应包括邛、笮、冉、骆这些民族在内。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邛属濮越系民族，而笮、冉、骆均属氐羌系民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实为精辟的概述。所谓夷指的是氐羌系民族，而越则指濮越系民族。其实，何止南中，整个巴、蜀，乃至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的构成基本超不过